

| 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文库 | 孙慕天◎主编

The Search on Forked Road

Contemporary Russia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歧路中的探求

——当代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万长松 / 著



科学出版社

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文库

The Search on Forked Road

Contemporary Russia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歧路中的探求

——当代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万长松 /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歧路中的探求：当代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 万长松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7.3

(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文库)

ISBN 978-7-03-052292-4

I. ①歧… II. ①万… III. ①科学哲学-研究-俄罗斯-现代 ②技术
哲学-研究-俄罗斯-现代 IV. ①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3011 号

丛书策划：侯俊琳 刘 溪

责任编辑：侯俊琳 刘 溪 刘巧巧 / 责任校对：何艳萍

责任印制：张 伟 / 封面设计：有道文化

编辑部电话：010-64035853

E-mail: houjunlin@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教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年3月第一版 开本：720×1000 B5

2017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0 1/2

字数：373 000

定价：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文库”编委会

主 编 孙慕天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长松 王彦君 白夜昕

刘孝廷 孙玉忠 孙慕天

张百春 崔伟奇 鲍 鸥

总 序

不知不觉间，21 世纪也已经快过去六分之一了。20 世纪虽然渐行渐远，但是，人们对这 100 年的评价却大相径庭，褒之者誉之为非常伟大的世纪，贬之者嗤之为极端糟糕的世纪，两种观点各有理由，倒是霍布斯鲍姆（E. Hobsbawm）的说法最接近历史的辩证法：“这个世纪激起了人类最伟大的想象，同时也摧毁了所有美好的设想。”

苏联 69 年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无疑是 20 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只不过它是最大的历史悲剧，以美好的憧憬开始，却以幻梦的破灭告终。在 20 世纪初叶，得到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十月革命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在 20 世纪末叶，流行的观点却是“苏联的解体是社会主义道路的终结”。苏联解体和十月革命一样震撼世界，无论是在那片土地上，还是在整个世界，人们都在思考这一最富戏剧性的历史事变。当然，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人们对苏联共产党的失败和苏联的崩解所持的态度各自不同。有的欢呼雀跃，认为是“历史的终结”，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这表明，“测量和找出旧体制的缺陷，原来只有一个一致的标准集：那就是自由民主，亦即市场导向的经济生产率和民主政治的自由”；有的则呼天抢地，哀叹这是“历史的大灾难”，如曾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惊呼，他们留给后辈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一副沉重的担子”。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说，苏联的兴亡史的确是比巴黎公社所包含的内容和提供的教训要丰富和深刻得多，对共产主义抱有信心的研究者应当珍视这笔巨大的财富，认真地进行反思和总结。现在，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已经走上了新的发展轨道，继续谱写一个伟大民族国家的新篇章。这段波澜壮阔的时代交响曲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对过去的反思，对未来的前瞻，是当代学人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中国是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最早抱有清醒认识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从主流思想说，我国的领导层和学术界是有共识的。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苏联教训的警惕和分析就已经开始了，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此具有先导和示范作用的恰恰是科学哲学领域。早在1950年，当苏联在自然科学领域大搞政治批判，对摩尔根遗传学进行“围剿”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指出其错误的思想倾向。1956年召开的青岛座谈会，则反其道而行之，对科学和哲学、科学和政治做了明确的划界。著名科学哲学家龚育之先生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就致力于苏联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先是总结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批判，后又具体分析了苏联哲学界用哲学思辨取代科学实证研究的重大案例。20世纪60年代，他致力于介绍苏联持正确观点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学术成果，坚持对苏联科学技术哲学进行系统研究。在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他发表了《苏联自然科学领域思想斗争的情况》和《历史的足迹》两部系统论著，奠定了我国苏联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可以说，我国的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有很高的起点，通过认真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为我国正确处理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制定合理的科学技术政策提供了重要鉴戒，也有力地推动了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论的建设。

改革开放初期，在龚育之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直接推动和指导下，一批中青年学者怀着新的目标热情地投入这项研究中。当时，在长期的文化锁国之后，学术界开始面对世界各种新的思潮，而西方科学哲学中的一些理论流派，如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库恩的范式论等，因为与思想解放的潮流有某种契合，一时成为学术热点，相应地，苏联学者如何评价西方科学哲学就成了学界亟待了解的学术动向。恰在此时，苏联也在“新思维”的旗号下热推改革，而以“六十年代人”为代表的苏联科学哲学家，早已率先从理论上向僵化的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发起了挑战。所有这一切，都引发了学者们的强烈兴趣，于是，国内的苏联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自然成了改革理论的一翼。

历史地看，苏联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一直活跃在我国学术的前沿。龚育之先生当年提出的方针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研究历史，是为了现在。”在那个时代，遵循这样的方针是现实的要求，有其历史必然性。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30年过去了，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中俄两国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语境也今非昔比。我们虽然不应当也不能够丢弃先驱者优秀的历史传统，但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如果说那时的研究主要是像鲁迅先生所说，是“借了别人的火来煮自己的肉”；那么，今天我们可以进入更广阔的学术空间，立场更

客观，认识更理性，视野更开阔，主题更宽泛。一方面必须继续深入总结苏联悲剧的历史教训；另一方面更应当密切注视新俄罗斯发展的未来趋势，只有如此，才能科学地认识世界，认识中国。这表明，我们这一代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者有太多的工作要做。

恩格斯说过：“各种不同的民族性所占的（至少是在近代）地位，直到今天在我们的历史哲学里还很少阐述，或者更确切些说，还根本没有加以阐述。”俄（苏）科学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国别研究，唯其属于苏联，属于俄罗斯，才有了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个性和共性、特殊和一般、相对和绝对的关系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也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俄（苏）科学技术哲学是人类科学技术、哲学理论、思想文化的丰富资源，其中包含了社会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教训，蕴藏着精神文明进步的潜在生长点，它的独特优势当然是这项研究的着力点。但重要的是与时俱进，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重新思考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进路。

苏联科学技术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导向的理论流派，新俄罗斯^①的科学技术哲学虽然不再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统一的指导思想，但苏联时期的传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下来。简言之，在学科的划界、问题的设立、范式的规定、体系的建构、概念的定义、理论的解释、成果的评价，一言以蔽之，在科学技术哲学的整个研究域，苏联和俄罗斯的学者都展示了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模式，是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的另一个维度，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可以比较和选择的参考系。

应当特别指出，苏联科学哲学一度是以本体论研究为中心的，尤其重视自然界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客观辩证法，相应地，所谓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主体则定位于各门实证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在科学史上，苏联科学家是最自觉地运用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具体科学研究的群体，如美国学者格雷厄姆（L. R. Graham）所说：“我确信，辩证唯物主义一直在影响着一些苏联科学家的工作，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影响有助于他们实现在国外同行中获得国际承认的目标。”自然界是辩证法的试金石，深入研究苏联科学家在实证科学研究中应用唯物辩证法的功过得失，具体分析那些重大的案例，不仅对于正确认识苏联科学技术哲学，而且对于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至对于全面评价整个科学技术哲学学科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格雷厄姆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在谈到上面

① “新俄罗斯”指的是 1992 年建立的俄罗斯联邦，以区别于苏联成立之前的旧俄罗斯。——编辑注

所说的研究主题时说：“所有这一切对一般科学史——而不单单是对俄罗斯研究——都是重要的。”当年，我们曾大力介绍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的具体成果，但是新时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完全中断了，现在，对这项研究应该有新的认识。

语境主义已经成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共识，其实对科技进步的语境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编史学，是有互文性和一定程度的契合性的。关于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对苏联科技进步的灾难性破坏，在西方，早已成为苏联学（Sovietology）的首选主题，在俄罗斯和中国也是对俄（苏）科学技术史和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重大关注焦点，各种文献汗牛充栋。问题是，即使在那样的语境中，仍然有一批学者拒绝附和斯大林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而是坚持正确阐释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并自觉地用唯物辩证法指导科学研究。如果说，对改革派科学哲学家的研究已经得到较多的重视，那么在同样语境下坚持正确哲学路线并继续以辩证法指导科学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却被忽略了。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鲍尔（R. A. Bauer）指出：“才能卓越、成就斐然的那些苏联知识分子认为，历史的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解释，在概念基础上是令人信服的。施密特、阿果尔、谢姆科夫斯基、谢列德洛夫斯基、鲁利亚、奥巴林、维果茨基、鲁宾斯坦等杰出的苏联学者，都强调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他们的创造性活动的启发意义，而且在被要求做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陈述之前，他们就已经这样做了。”显然，这是今后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填补的空白。

科学技术哲学与俄（苏）特殊历史语境的关联还有许多未被触及的方面，如斯拉夫文化传统对俄（苏）科技进步的影响就值得深入探索。旧俄罗斯（沙皇俄国）被称作第三罗马，“正教、君主制、民族性”是斯拉夫文化传统的核心，其主流思维方式属于出世的理想主义应然范畴，而不是入世的功利主义实然范畴。集中而不是发散，醉心于信仰，强烈的民族主义，都深植于民族文化精神的本底，所有这些不仅一直支配着俄（苏）公众的社会心理，也全面规范了俄（苏）哲学乃至科学技术哲学的特质。格雷厄姆在谈到苏联科学家时说过一句话：“他们中最明智的一些人甚至会同意，哲学唯物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可以证明的理论，不如说是多数学者赞同的一种信仰。”行文至此，使人联想起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著名复信草稿中对俄国社会基础的研究，他认为俄国作为欧洲唯一保留农业村社作为社会基础的国家，其特征就是“它的孤立性”，“保持与世隔绝的小天地”，而“有这一特征的地方，它就把比较集权的专制制度矗立在公社的上面”。我们不能不承认，俄（苏）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的曲折过程及其内在

的诸多矛盾，正是折射出俄罗斯社会文化语境的结构特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官方有意扶植和依托东正教，旧俄时代的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等的宗教哲学思想大有主流化的趋势，对新俄罗斯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这就是说，从文化语境上研究俄（苏）科学技术哲学，还有许多需要深入挖掘的地方。

在整个苏联哲学中，也许还可以说，在整个苏联文化中，科学技术哲学占据十分特殊的地位。第一，相对于其他部门，相对于政治和官方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哲学受的负面干扰较少，始终保持自己的学术独立性；第二，科学技术哲学率先举起反官方教条主义的旗帜，成为苏联社会改革的思想先驱；第三，科学技术哲学是整个苏联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始终保持连续性的学科部门，即使在苏联解体后的新俄罗斯时期，原来的许多研究结论仍然得到肯定，一些研究方向仍在继续向前推进；第四，俄（苏）科学技术哲学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完全可以和西方同行相媲美，而且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承认。我曾把上述事实称作“苏联科学技术哲学现象”，认为对这一现象的解读，可以揭示俄（苏）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史和外史的许多深层本质。作为国际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权威学者，格雷厄姆就曾敏锐地注意到这个特异的现象，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过去七十年间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们在科学哲学中努力创新，在同其他思想的尖锐冲突中卓然独立。也许，苏联在自然哲学领域比其他思想领域有所成就的一个更重要原因在于，尽管存在共产党控制思想生活的体制，但和政治主题相比，这种体制给予科学主题以更多的创造空间。众多英才潜心研究科学课题，而其中一些人自然而然地为其工作的哲学方面所吸引。在苏联的特殊环境下，对作者们说来，辩证唯物主义讨论的深奥性质还有某种免遭检查的好处。”格雷厄姆的解读不无道理，但仅停留在现象学层面，未触及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性质等本质问题。科学技术哲学在近日俄罗斯的地位有所变化，但与其他哲学部门相比，仍有其特殊性。总之，科学技术哲学在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的特殊地位问题，是我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者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

我国新一代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者特别注意俄罗斯技术哲学的发展，这不是偶然的。相对于科学哲学而言，苏联时期的技术哲学因为意识形态原因，曾一度遭到冷遇或被片面理解。而在新俄罗斯却因为技术与人的本质、与生存环境、与社会伦理、与文明转型的密切关系，而成为科学技术哲学的人本主义转向的中心枢纽。一批中青年学者敏锐地察觉到这一重要学术动向，并为之付

出了巨大的努力，已有几部重要成果问世，成为新时期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亮点。

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对俄（苏）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科学技术哲学的比较研究表明，二者存在着明显的趋同演化过程。就西方科学技术哲学来说，从认识论转向到语言学转向，从人工语言哲学到日常语言哲学，以逻辑实证论为主导的“冰峰上的哲学”让位给以世界观分析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主义；就俄（苏）科学技术哲学来说，从本体论主义主导的自然界客观辩证法研究，转向认识论主义主导的科学结构学和科学动力学研究，进而发展到人本主义主导的科学文化研究。两两相较，可以发现，世界科学哲学的发展逻辑是从走向客体（本体论的形而上学）转到走向主体（认知主体的活动反思），再转到走向历史（文化价值语境的研究）。不仅发展过程上存在趋同演化，而且在内容结构上同样存在明显的理论趋同。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西方和俄（苏）科学哲学在结构学上都把前提性知识的研究置于中心地位，而在动力学上则聚焦于科学革命的全域性分析和概念重构。布莱克利（T. J. Blackley）在《苏联的知识论》一书中明确断言：“苏联哲学家对待越来越多的问题的方式，与西方对这些问题所采用的方式多半相同。”他认为区别只是在所使用的词汇上，而“致力于解释和标准化的词汇表就可以打开哲学上接触的广阔前景”。这位波士顿学院的学者是很有见地的，我们应当在世界科学技术哲学的整体文化背景上，以时代发展的眼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俄（苏）科学技术哲学重新进行审视。实话说，在这方面我们仍然不够自觉，而俄（苏）学者是有这种自觉性的，当年科普宁（П. В. Копнин）就说过：“对世界过程的真正理解既不是他们（西方），也不是我们。将来的某一时刻会产生第三方，而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全力促进这一发展。”今天，全球化已经成为时代不可阻挡的趋势，每个民族的命运都与整个人类的命运紧密相关，俄（苏）科学哲学的领军人物弗罗洛夫（И. Т. Фролов）说：“可以再一次想一想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说，俄罗斯的命运‘在全世界的整体性的团结之中’，在精神和物质的团结之中。现在，这是最重要的。”站在历史转折的关头，我们中国的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者理应从这样的思想高度促进这一学科的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的中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21世纪以来，在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新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他们无论在目标上，在学识上，还是在眼界上，都有了更高的起点，已经开始回答我在上面所提出的那些新的学术问题。近些年来，他们从新的角

度出发，采用新的方法，特别是通过与俄罗斯学者的直接对话和交流，全面推进了这项研究，并且成果斐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研究几乎是与 21 世纪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同步的。古人说，明达体用，这批研究成果既在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上有重大的推进，实现了学术本体上的创新，又有直接的现实关怀和强烈的问题意识，显示了重大的实际应用价值。

现在，科学出版社决定把这些成果会集起来，作为“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文库”出版。新时期我国的文化开放是全方位的，且不说对西方的研究差不多已经没有什么死角，就是有关苏联和俄罗斯的研究也几乎实现了全覆盖，但是，唯独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的出版物却寥若晨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这里我不想对此进行追究，因为那是业内工作方面的检讨。应当说的是，感谢科学出版社对学术发展的深切关怀，以超越的学术眼光，把这株含苞欲放的稚嫩花株培植起来，让它在百花园里开放，点缀这繁花似锦的学术春天。

不能奢望这一文库短时期内会引起多大关注，也不应责怪人们对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的冷落，因为对这一领域的误解由来已久，30 多年来，这一学科的边缘化是有深刻历史原因的。然而，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在漫长的岁月里，在这个重要的学科领域中，毕竟结出了而且还在继续结出累累硕果。虽然和一切文化生产一样，其中不免混杂着种种糟粕，但其中的精华却是人类精神文化宝库中的珍品，挖掘、清理、继承、发扬这一领域的遗产，密切关注所发生的变化和最新动向，既是对这个国家学术工作的尊重，也是这些成果本身固有的历史的权利，谁也不应也不能剥夺这一权利。我相信，无论久暂，正确认识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真正价值的日子必将到来。恩格斯说过：“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的后果。……历史权利没有任何日期。”历史权利是没有日期的，但是我们却有义务促进历史进程的发展，这是“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文库”的编著者和出版人共同的心愿。

孙慕天

2016 年 11 月 19 日

序

平凡的日常生活史差不多都是一样的，而推动人类社会变革的历史则是曲折而充满各种苦难和矛盾的历程。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正是这样的不平凡的历史，而对这一历史的总结，尤其需要理性和客观的眼光。当前，由于世界形势的巨变和历史思潮的走势，人们对苏联的评价大多是负面的，至于苏联和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则是一个小小的学术角落，处于几乎已经被人们遗忘的冷僻荒凉的边缘地区。正逢盛年的万长松竟以全部精力在这个学术角落里默默地垦殖，并将自己精心培育的《歧路中的探求——当代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这株绚丽的鲜花奉献给我们，站在今天的历史节点上，这一力作引发了我的绵绵思绪。

在我国，苏联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这一学术域是龚育之先生开拓出来的。龚师回忆说，从20世纪50年代中到60年代初，“曾经两次对苏联这方面历史进行过集中的了解和研究”，“这方面”指的就是“有关苏联自然科学领域哲学争论”。龚先生指出，当时这项研究的目的很明确，是“为了总结历史教训，纠正‘左’的错误，以便贯彻执行我们党提出的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方针”^①。“文以载道”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治学的精神圭臬，历史地看，基于20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语境，把苏联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置于时代的大纛之下，是时势使然。1978年7月13日，在北京市委党校的礼堂举行的“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上，龚师做了题为“自然辩证法工作的一些历史情况和经验”的报告，我在台下亲耳聆听了这次讲座，主题正是对苏联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走过的弯路所

^① 龚育之：《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2页。

做的系统反思。1982年10月28日，他在重印这份讲稿时说，这篇讲话是在四年多以前，“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了系统的拨乱反正，大家对历史经验的认识大大加深了，在自然辩证法领域也是如此”。一年后，我受龚师委托编辑“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丛书”，他对我耳提面命，那编辑方针赫然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研究历史，是为了现在”^①。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学术复兴的火红的年代，人们心中燃烧着寻求真知的热火，毫无畏惧，一往无前，西方科学哲学不再是禁脔，波普尔和库恩等的理论一下子成了思想解放的思想工具，而我和几个朋友却觉得应当旁行以观，把目光转向正在变革中的苏联。我们觉得，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苏联科学技术哲学所提供的思想资源，对改革开放的中国是十分有诱惑力的。几位同道于是另辟蹊径，在龚育之等前辈学人的支持和扶植下，开发了这个新的研究空间，当然，那时还是有明确的现实指向的，所瞄准的主要是苏联改革的哲学理论基础。

为学术而学术确实超然，就具体论题的探索来说，中立的立场也的确是追求真理的前提，但学术研究的整体却是无法脱离价值方针的选择的。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常常被人误解，以为克罗齐是以实用主义态度把历史看成只是为现实服务的工具。其实，克罗齐此语本质上是说，过去只有和当前的视域有所（不同程度）重合，才能为人所理解，所以他又说：“历史学绝不是有关死亡的历史，而是有关生活的历史。”^②记得就在1978年那次讲习会的报告中，龚先生引用了一句马克思的话：“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③这段话真是精彩极了，我查了许久，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找到它。苏联科学技术哲学的滔滔思辨，终究要受生活实践和科学实践的检验，对其成败利钝的反思构成了苏联的科学编史学。随着冷战落幕和苏联解体，“历史终结论”一度成为西方对人类未来的盖棺定论，苏联的一切连同它的所有学术成果，都被弃之如敝屣。但是形势比人强，曾几何时，连弗朗西斯·福山本人都放弃了这一论断。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后工业时代社会矛盾的暴露，马克思的理论正在重新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学说和观点都在接

① 龚育之，柳树滋：《历史的足迹》，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②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0-31页。

受马克思主义的检验。保罗·托马斯 (Paul Thomas) 在《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的当时和现在》一文中，引用戴维·麦克莱伦 (David McLellan) 的话说：“纵观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马克思也许对 20 世纪最有影响的人物一直都在进行检验。”^① 苏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虽然有惨痛的教训，但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提供了大量新的生长点。对这一点，西方严肃的苏联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者自有公论。美国著名的苏联学专家格雷厄姆一直对此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具有优势的哲学世界观，所代表的是科学导向的、理性的、唯物主义的研究方式，“现代苏联辩证唯物主义是一项引人注目的思想成就。把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初始见解阐述和发展为系统的自然解释，这是苏联马克思主义最新颖的思想创造。在其最富才能的倡导者手中，辩证唯物主义无疑是理解和说明自然的一种真诚的和合理的尝试。凭借其普适性和发展程度，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解释在现代思想体系中无可匹敌”^②。他认为许多杰出的苏联科学家真诚地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对科学的启发意义，并在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格雷厄姆通过大量案例分析，用确凿的事实证明：“辩证唯物主义一直在影响着一些苏联科学家的工作，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影响有助于他们实现在国外同行中获得国际承认的目标。”^③

苏联科学技术哲学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试金石。一方面，在十月革命之后的 70 多年的探索中，反复检验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真理性，验证了这一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启发价值。另一方面，通过比较苏联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不同范式，特别是和后苏联时代 (即所谓新俄罗斯) 的科学技术哲学进行关联性研究，可以揭示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的普遍规律，不但可以认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的历史命运，而且有助于预见世界科学技术哲学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的一般趋势。

在苏联的人文社会科学中，科学技术哲学地位比较特殊。从根本上说，科学技术哲学主要是对实证科学的研究成果、研究过程和方法进行的哲学反思，

① Thomas P. Critical Reception: Marx Then and Now, In: Terrell Carver,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3.

② Graham L.R. *Science, Philosophy and Human Behavior in Soviet Un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429.

③ Ibid. P.3.

所面对的是事实判断，就对象本身来说，是与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较为疏离的。尽管可以对科学认识的过程和结果做出不同的哲学解释，但是与研究对象的符合始终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中立指标。萨多夫斯基（В. Н. Садовский）说：“尽管科学知识的哲学观念可能有本质的区别，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马克思主义和新实证主义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是这些哲学解释所面对的模式，如科学知识的演绎模型，却可能是相同的。这表明模型对哲学解释的相对独立性。”^① 这使科学哲学研究得以避开政治敏感问题，因此如布莱克利说的那样，科学技术哲学“本质上是附属于苏联哲学运动的其他方面，所以也许是现代苏联哲学部门中最游离于教条边界之外的领域”^②。也许正因如此，这一领域在苏联哲学中独放异彩，许多成果在世界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弗罗洛夫评价说：“我们可以说，我国对科学哲学的研究现在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达到世界水平。”^③ 斯焦宾（В. С. Стёпин）也认为，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直接相关的方向，“长期以来是显示为最富创造性和最有建构性的”^④。

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对待前人的学术成果应当从“照着讲”到“接着讲”，最后发展到“对着讲”。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学术界对本土的科学哲学正在努力超越，这首先是形势发展的结果。1997年，马姆丘尔（Е. А. Мамчур）、奥伏钦尼科夫（Н. Ф. Овчиников）、奥古尔佐夫（А. П. Огурцов）等三位权威科学哲学家出版了《国内科学哲学：初步总结》一书，对苏联及解体后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功过得失做了全面的评述，其中对苏联时期的研究成果有的“照着讲”，更多的是“接着讲”，亦即有所修正和引申，但也有的是“对着讲”，对以前的结论提出批判。作者说：“我们生活在转折的时代——剧烈转折的时代。一切都改变了：兴趣、风格、价值和观点。这些改变也涉及科学，而且不能不在直接同科学相关的智力活动领域——科学哲学打上自己的印记。智力运动已经在科学哲学中聚集了巨大的力量，其代表人物力图证明，科学的

① В. Н. 萨多夫斯基：《科学模型及其哲学解释》，孙慕天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4年第3期，第72页。

② Blakeley T. J. *Soviet Theory of Knowledge*, Boston: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64, pp.140-141.

③ И. Т. 弗罗洛夫：《60—80年代苏联哲学总结与展望》，贾泽林译，《哲学译丛》，1993年第2期，第11页。

④ Степин В. С. Анализ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философии в СССР, см.: рэхэм Л. Р.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е, философия и науки о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 поведени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пер.: М. Д. Ахондов и Б. Н. Игнатьев,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1, С.431.

‘成年时代’已经到来了。在现代文化中科学和科学理性已经不起也不应起支配的作用了，因为它们似乎不再为其所荷载的信念辩护，也不仅不给人带来福祉，反而成为不幸的缘由。对现代科学现象的诚实公正的分析，对指向科学引发的忧虑和与之相关的期望的研究，可能是科学哲学家对上述心态的最好回应。对科学现象的思考过程应该继续下去，正像对这一过程本身的批判分析过程应该继续下去一样，这一过程不断促动它、给予它新的动力。”^①

万长松的这一成果是对前人在这一领域研究的重大推进。如果说，龚育之的《历史的足迹》主要是总结 20 世纪上半叶苏联在科学和哲学关系方面、斯大林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发展方面的经验教训，孙慕天的《跋涉的理性》把注意力聚焦于苏联反主流派，特别是 20 世纪后半叶改革派科学哲学家的理论突破，那么万长松的《歧路中的探求》则是对世纪之交新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线索的梳理重构。该书没有以苏联解体为隔点截断苏联的文化思想的发展，而是认为俄（苏）科学技术哲学是一条“川流不息的大河”，这是一种宏阔的历史眼光。万长松以 20 世纪苏联哲学界“六十年代人”发轫的新哲学运动为原点，追溯近 30 年来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演变趋势，慎终追远，匠心独运，因为正是那次以认识论主义为标榜的思想运动，突破了教科书马克思主义的藩篱，打开了科学哲学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闸门。该书提出新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的三个范式，即多元论、文化论、人中心论，准确地抓住了这一转型的理念进路，慎思明辨，探赜发幽。该书指出，新一代的俄罗斯科学哲学家正在不同的道路上，以不同的方式，探索着科学哲学发展的新路。在我看来，如果说凯德洛夫、伊里因科夫（Э. В. Ильенков）、科普宁（П. В. Копнин）是俄（苏）新哲学运动的“老三驾马车”，弗罗洛夫、斯焦宾、施维廖夫（В. С. Швырёв）是“新三驾马车”，那么万长松重点论述的罗佐夫（М. А. Розов）、奥古尔佐夫、盖坚科（П. П. Гайденок）就是“后三驾马车”。主角的更迭清晰地勾勒出半个世纪以来，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的洪流阶段性推进的历史轨迹。道路崎岖，但是思想在发展。俄罗斯学者巴扎诺夫（В. А. Бажанов）说：“主张俄罗斯哲学思想和研究正在衰落是夸大其词。”^②该书正是通过深入梳理俄

① Мамчур Е. А., Овчинников Н. Ф., Огурцов А. П.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науки: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е итоги*, М.: РССПЭН, 1997, С.356-357.

② Bazhanov V. A. *Philosophy in Post-Soviet Russia*(1992-1997), *Studies in East European Thought*, 1999, 15(4), PP.1-27.

(苏)科学技术哲学一波三折的曲折发展道路,窥视俄罗斯哲学思想进步的历史轨迹的。

《歧路中的探求》概括了新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的总体倾向是工具主义的衰落和社会文化主义的勃兴,这也切中肯綮。近年来,俄罗斯和西方的苏联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21世纪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这一新取向。例如,2005年俄罗斯学者奥古尔佐夫在欧洲的《东欧思想研究》杂志上撰文,肯定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优势在于:把科学视为人类精神的普遍劳作,突出了科学的社会性,使科学哲学研究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把科学研究的过程和结果、科学和权力、科学和生产、科学和社会组织结合起来,强调了科学活动的社会-历史和社会-文化语境分析。^①阿罗诺娃(E. Aronava)则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研究纲领的博士生,她是论文《苏联科学研究的政策与语境:十字路口的苏联科学哲学》的作者,该文主旨是讨论苏联的科学建制和科学反思模式如何主导了苏联的科学编史学,认为苏美两国的科学元勘叙事的术语具有互文性,而苏联的科学技术革命的话语系统成为苏联官方将其经济设计合法化的概念框架,也是学者们将其局域化以服务于自己个人学术兴趣的概念基础。^②而年逾古稀的格雷厄姆也集中对俄(苏)科学技术社会语境进行分析,连续推出《莫斯科的故事》(2006年)、《新俄罗斯的科学:危机,援助,改革》(2008年)、《单一的观念:俄罗斯能竞争吗?》(2013年),明显转向苏联科技进步的科技社会学和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他致力于从科学社会学方面解读俄罗斯和苏联在科技进步事业方面的历史上下文。在《单一的观念》一书中,他指出,在3个世纪的时间里,俄罗斯在科技市场化方面始终一筹莫展,缺乏建立科技进步动力机制的社会条件——科技创新的培育、体现发明和实践的社会价值取向、保障科技创新的经济基础、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等,而这和俄罗斯在文学艺术和纯科学方面的辉煌成就是不相称的。所以整个说来,俄罗斯的科学技术哲学已经与科学元勘密不可分,甚至成了科学元勘的一部分。^③

① Ogurtsov I. P., Neretina S. S., Assimakopoulos M. 20th century russia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 *Studies in East European Thought*, 2005, 57(3), PP.33-60.

② Aronava E. The politics and context of Soviet science studies: Soviet philosophy of science at the crossroads, *Studies in East European Thought*, 2011, 63(3), PP.175-202.

③ Graham. L. R. *Lonely Ideas: Can Russia Compet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3.